

阎琦 注评

# 李白 诗选评

名家注评  
古典文学丛书

陕西出版集团  
三秦出版社

本书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项目

阎琦 注评

名

家

注

评

古

典

文

学

李白

诗选评

书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李白诗选评/阎琦注评. — 西安 : 三秦出版社,  
2010. 9

(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)  
ISBN 978-7-80736-795-6

I. ①李… II. ①阎… III. ①李白 (701~762) — 唐  
诗—文学评论 IV. ①I207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10855号

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

李白诗选评

---

阎 琦 注 评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 
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

电 话 (029)87205125

邮政编码 710003

印 刷 陕西省汉中印刷厂

开 本 890×1240 1/32

印 张 11.125

字 数 200千字

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 
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2000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36-795-6

定 价 24.00元

---

网 址 [WWW.sqcbs.com](http://WWW.sqcbs.com)

#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

学术顾问：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

王运熙 王水照 钱仲联 袁行霈

郭预衡 曹道衡 傅璇琮 褚斌杰

编辑工作委员会：

傅璇琮 王水照 陶文鹏 魏全瑞

薛瑞生 阎琦 淡懿诚



序

言

李白，字太白，陇西成纪（今甘肃秦安）人。关于李白的籍贯，学术界颇多争议。李白曾说：“白，陇西布衣，流落楚汉。”（《与韩荆州书》）又说：“本家陇西人，先为汉边将。”（《赠张相镐二首》其二）陇西是秦汉时郡名，为李姓郡望；所谓“汉边将”，即李广，其为陇西成纪（今甘肃秦安县）人。唐人喜以郡望称其姓氏，而李广距李白又太遥远，陇西是否就是李白的籍贯，后人是颇存疑问的。但李白又自称是东晋安帝时（公元397—418年在位）据有河西五郡（今甘肃西部）的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，见于李阳冰的《草堂集序》和范传正的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》。李阳冰与李白同时，唐代宗宝应元年（762），李阳冰为当涂令，受卧病不起的李白之托为其编集作序；范传正年齿晚于李白约五十岁，唐宪宗元和十五年（820）为宣歙观察使时，曾寻访到李白两个孙女，完成李白遗愿，迁白墓于新址。他们关于“凉武昭王九世孙”的说法，一得自李白口述，一得自李白之子伯禽亲笔手疏，其可信程度都是不容置疑的。李暠正是汉名将李广后代，故“凉武昭王九世孙”之说，与李白自称的“陇西人”、汉李广之后并不矛盾。所以，说

李白的籍贯是陇西，大致可以肯定。

李白出生于唐武则天长安元年(701)，其出生地，在中亚碎叶(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)。碎叶是唐代西域汉胡客商杂居及商品的重要集散地，据此推知，李白的父祖辈应是西域富商无疑。自李暹至李白，其间九代人的变迁，李白曾有这样的叙述：“白本家金陵(按：金陵当为金城之误。金城即今甘肃兰州，秦汉之际，金城亦属陇西郡范围)，世为右姓，遭沮渠蒙逊难，奔流咸秦，因官寓家。”(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)李白所说的“沮渠蒙逊难”，发生在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(421)。李暹死后，其子歆、恂继立，皆为沮渠蒙逊所攻灭。歆、恂既死，歆子重耳奔于江左，后归魏为官，即“奔流咸秦，因官寓家”。当李白五岁时，其父率一家人归于蜀，定居于唐时剑南道绵州昌明县青莲乡，即今四川江油县。李白家世最大的疑团在于此：李白祖上因为什么原因迁徙到远离中原的西域碎叶？关于这一点，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云：“中叶非罪，谪居条支，易姓与名……神龙之初，逃归于蜀，复指李树而生伯阳。”范传正《新墓碑》云：“隋末多难，一房被窜于碎叶。流离散落，隐易姓名。神龙初潜还广汉，因侨为郡人。”李《序》所说的“中叶”，是指李暹与李白九世之间，即李白的四世祖时，其时正当范《碑》所说的“隋末”(约605—618)，上距李白诞生不足一百年，恰好是四代人。范、李所述，大致相同。问题的关键是“非罪”“多难”，具体是什么罪、什么难，就不得而知了。虽然如此，从“易姓与名”与“隐易姓名”看，罪名或者灾难是很可怕的，直到李白诞生，才恢复“李”这个本姓。

关于李白的家世，可以称得上是扑朔迷离、又充满了某种神秘和传奇色彩。李白的父亲名客，“客”显然不是名字，只是本地人对外乡人的称呼。李白排行十二，足见他同宗兄弟很多，但李白所有诗文中几乎没有语及父母与兄弟。李白自二十五岁离开蜀地远游，此后近四十年没有回归故乡。此外，还有他种种离奇的言行，不同凡响的经历，甚至他的婚配（两次婚姻皆前宰相家孙女），大半个世纪以来，曾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兴趣，作了多种大胆而有意义的探索。例如关于李白的身世，有李白为胡人的说法；有李白系李陵（李广长房长孙）投降匈奴以后娶妻生子在北方（或西域）绵延下来的后代的说法；有李白原是李世民之兄李建成之子、经“玄武门之变”后逃脱追杀流亡到西域的后代的说法。关于李白的出生地，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，如焉耆碎叶说，条支说，蜀地说，长安说等等。

李白的家世究竟怎样，出生地究竟在何处，并不妨碍李白作为一个诗人的伟大。但是，倘能揭开环绕在李白身上的这一团迷雾，确实有助于了解李白思想的底蕴。李白的幽怨、悲愤和不平，仿佛总有一个神秘的内核存在。中国古典诗歌，抒情言志是其最基本的功能；作为抒情主观性很强的诗人李白来说，尤其是如此。李白诗歌的抒情，有时是明朗的，有时却包藏很严密，言在此而意在彼。所谓知其人而论其世，研究者在读到这些比兴深微的诗歌的时候，不免要将对这些诗歌的解读与诗人神秘的身世联系起来。然而，就现有的资料看，彻底揭开这些迷雾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致使李白研究者抱无尽的遗憾。

李白是我国自屈原以后最伟大、成就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。终其一生，他以其横溢的天才，“一斗诗百篇”的敏捷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。虽然大部分诗歌当时即散佚无法寻觅，“流落人间者，泰山一毫芒”（韩愈《调张籍》），传世的《李太白文集》仅保留了近千首诗而已。但是，这些诗作，绝大部分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，是当时社会、尤其是诗人心灵的写照，成为中华民族、乃至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李白一生，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。

第一时期：蜀中时期（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以前，李白5-25岁）。

蜀中是李白的故乡。李白幼年事迹，多不可考知。据其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所云“五岁诵六甲，十岁观百家”可知，李白一家自西域归来，其父即让他发蒙读书。“六甲”应是小孩启蒙识字一类读物，到十岁，李白读书的范围已经相当可观。“百家”指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。到了十五岁，李白基本上已学有所成了：“十五学神仙，游仙未曾歇。”（《感兴八首》其五）“十五学剑术，遍干诸侯。”（《上韩荆州书》）“十五观奇书，作赋凌相如。”（《赠张相镐二首》其二）又可知少年李白的学习爱好，与当时多数世家子弟少年时期的学习途径大不相同。这反映了李白一家久居西域表现出来的文化开放性。当然，李白也有与其他少年相同的一面，即开始学习写诗作赋。《李太白文集》卷三十“诗文拾遗”部分有几首五律以及《拟恨赋》等，即是此期的习作。五律和赋，是唐代科举（主要是进士科）官方规定的正式体裁，唐代科举，尤其



是进士科，考试经书以外，诗（五言排律一首）、赋（律赋）是必考科目。初习诗文由五律、赋开始，是应科举的需要。然而，李白终其一生未参加科举考试，其中当有深意，或可引起研究者的兴趣。

开元八年（720）春李白二十岁时，曾有一次蜀中漫游：往梓州，游成都，登峨眉，至渝州。在成都，李白曾于途中谒见了对他一生有巨大影响的第一个人物：益州（即成都）大都督府长史苏颋。苏颋是玄宗时有名的宰相，封许国公，善文章，与张说齐名，并称“燕许大手笔”（张说封燕国公）。其时苏颋罢礼部尚书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李白后来在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中记其与苏颋相见之事云：“又有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，白于路中投刺，待以布衣之礼。因谓群僚曰：‘此子英丽，下笔不休，虽风力未成，且见专车之骨。若广之以学，可以相比如肩也。’”苏颋的夸赞对李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，开元十三年（725）春，二十五岁的李白即决心去蜀远游。

第二时期：去蜀漫游及“酒隐安陆，蹉跎十年”时期（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到开元二十七年，李白25—39岁）。

李白刚一出蜀，即在江陵遇见了对他一生影响巨大的第二个人物：司马承桢。司马承桢字子微，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道家名流，武则天、唐睿宗时曾先后召他入宫，问以阴阳术数之事。开元九年，唐玄宗又召他入宫，侍奉玄宗达一年之久。开元十三年之际的司马承桢，已七十八岁高龄，见到李白，鼓励有加，李白为之作《大鹏遇希有鸟赋》（后改名《大鹏赋》），序云：“余昔于江陵，见天台司马子微，谓余有仙风道骨，可与神游八极之表。因著有《大鹏遇希有鸟赋》以自广。”赋中那“足紫虹蜺，

目耀日月”“喷气则六合生云，洒毛则千里飞雪。邈彼北荒，将穷南图。运逸翰以旁击，鼓奔飙而长驱”的大鹏，就是李白自己的写照。

李白沿江东下，次第游历了江夏、金陵、扬州及越中（会稽）。途中他广交朋友，散漫使钱，肆意挥霍资财，直到囊中金尽。李白的这一番漫游称得上是一次“壮游”。资斧用罄对他来说不是问题，他要的是名誉和声望。他的目的也达到了，诗歌开始流传，一篇《大鹏赋》，“往往人间见之”（《大鹏赋序》）。开元十五年（727），李白溯江而上，在安陆安顿下来，并与高宗时故相许圜师的孙女结婚。新婚之初的生活或者是惬意的，以安陆为中心（襄阳、江夏、洛阳等）的漫游也增长了见识，但政治追求却是失意的。李白后来将安陆时期一段生活称之为“酒隐安陆，蹉跎十年”（《秋于敬亭送从侄崱游庐山序》）。他所谓的“蹉跎”，主要指他开元十八年（730）前后入长安的那一次失败的经历。

李白自安陆取道南阳，满怀盛气北上长安，不料在长安受到了驸马都尉、时任卫尉卿张垆的冷遇。秋雨连绵中，他被安置在玉真公主别馆、其实是一座破败的荒园里。“食无鱼，出无车”，“张公子”以及长安豪贵似乎忘记了他的存在。这对原先自视极高、以为取功名不过如探囊取物一般的李白来说，该是多么大的讽刺！李白在长安，历时一年有余，始终徘徊于君门而不得入。由于干谒无门，遂与长安少年浪游，日以斗鸡、走狗、饮酒、赌博为事。于沉沦、懊丧中，他认识到了所谓“开元盛世”的另一面，注意到了社会许多不合理的现象：长安大街上，大车扬尘而过的，是多黄金的“中贵”；而连

云般的甲宅，则为斗鸡者所有（见《古风》其二十四），于是他不得不高呼：“奈何青云士，弃我如尘埃！”（《古风》其十五）。李白只好铩羽而归。

第三时期：移家东鲁与待诏翰林时期（开元二十八年到天宝三载，李白40—44岁）。

开元末，李白移家东鲁。许氏夫人的去世可能是他移家的主要原因。李白原来应是“赘”于许家的，夫人去世，故难立足。“我家寄在沙丘旁”（《送萧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》），“我家寄东鲁，谁种龟阴田？”（《寄东鲁二稚子》）“沙丘”在瑕丘县，唐时为兖州治所。李白后来在此置田产，俨然一山东人（杜甫诗：“近来海内为长句，汝与山东李白好”；元稹《杜工部墓系铭》亦称“山东人李白”）。李白为何移家在东鲁，甚或以“山东人”自居，亦恐有深意在焉。

李白在山东，先与孔巢父等隐居徂徕山，又曾往嵩山访元丹丘，积极地为再入长安作准备。元丹丘是影响李白一生最重要的第三人。李白访元丹丘不久，元丹丘即奉诏入朝，为西京大昭成观威仪，即朝廷聘任的道家顾问官，与玉真公主（玄宗妹）交往甚密。天宝元年（741）秋，朝廷下达征召李白入朝的诏书。魏颢《李翰林集序》谓白“与元丹丘因持盈法师达”；玉真公主好道，“持盈法师”是她的道号。正是因为元丹丘荐李白于玉真公主，再经玉真公主荐于玄宗，李白才得以再入长安。玄宗召见李白于金銮殿。李阳冰在《草堂集序》中记其事云：“天宝中，皇祖下诏，征就金马门，降辇步迎，御手调羹以饭之，谓曰：‘卿是布衣，名为朕知，非素蓄道义，何以及此？’置于金銮殿，出入翰林中，问以国政，潜

草诏诰，人无知者。”礼仪隆重，几乎超越了君臣之礼。然而李白真正的身份只是玄宗的文学侍从，所谓待诏翰林，实际上多是侍从陪游之类。当时的唐玄宗，已非往日宵衣旰食、励精图治的英明天子，他召李白入京，并非求辅弼之才，而是为了点缀其风流天子生活。对于这种文学侍从的身份，李白的态度是矛盾的，一方面满意，因为多少满足了他建功业、求富贵的夙愿，“昔在长安醉花柳，五侯七贵同杯酒。气岸遥凌豪士前，风流肯落他人后？”（《流夜郎赠辛判官》）另一方面，他又是痛苦的，不堪“倡优”一般的宫廷文人地位，渐渐对待诏翰林生活感到厌倦不满，“歌咏之际，屡称东山”（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），再加上不断受到谗忌和诽谤，于是，天宝三载（743），李白决意请求还山（过隐居生活）。李白志在匡君济时，而玄宗意在点缀升平，君臣志趣相左，故玄宗不甚挽留，赐金，准其还山。

第四时期：去朝漫游与南寓宣城（天宝三载到天宝十四载，李白44—55岁）。

李白去朝后，先到洛阳，与时年33岁的杜甫相遇，二人甚是相得。嗣后又与诗人高适相约，漫游梁宋、齐鲁，杜甫诗云：“余亦东蒙客，怜君如弟兄。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。”（《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》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其后，李白在齐州授道籙（正式“在编”的道教徒）。李白与道家多有往来，但正式成为一名道教徒，则标志着他思想发生了某种大转折。回到东鲁后，“又于任城构酒楼，日与同志荒宴其上，少有醒时。”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二〇一引《本事诗》）天宝六载到九载，李白自东鲁南下江南，以金陵为中心长期漫游，东至吴越，西至

九江、庐山，足迹飘忽不定，“间携昭阳、金陵之妓，类迹谢康乐，世号为李东山。骏马美妾，所适二千石郊迎，饮数斗，醉则奴丹砂抚《青海波》，满堂不乐，白宰酒为乐。”（魏颢《李翰林集序》）授道籙、漫游、求仙乃至狂饮，皆与他待诏翰林“攀龙堕天”的一番经历有关。愈是大追求，乃有大失望、大痛苦，都是他摆脱痛苦、麻醉神经的表现。

天宝中后期，李林甫屡兴冤狱，朝政日坏，“少年早欲五湖去，对此弥将钟鼎疏”（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），因为报效无门，李白此期疏离、甚至厌恶政治的心情非常强烈；然而李白终不能忘怀朝廷，“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”（《登金陵凤凰台》）天宝十载，李白忽有幽州之行。幽州为安禄山老巢，天宝末，安禄山由此地发动叛乱，彻底改变了唐帝国的命运。李白幽州之行的目的何在？行前，李白诗有云：“不然抚剑起，沙漠收奇功。”（《赠何七判官昌浩》）幽州途中又有诗云：“且探虎穴向沙漠，鸣鞭走马凌黄河。”（《留别于十一兄游塞垣》）天宝后期，安禄山已身兼三镇（河东、平卢、范阳）节度使，拥兵十数万，唐玄宗对其“忠心”深信不疑，朝中大臣对安禄山看法不一。安禄山屡屡做出“礼贤下士”姿态，大批希求功名的文士也汇聚到安禄山麾下谋求出路。李白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态下冒险前往幽州的。在幽州，李白看到的是野心膨胀的安禄山，“君王弃北海，扫地借长鲸”（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），李白预感到天下大乱在即，天宝十二载，李白南寓宣城，游历宣州山水，借山水之乐以忘情世事。

第五时期：从璘、判流夜郎和病卒当涂（唐肃宗至

德元载到唐代宗广德元年，李白 56—63 岁）。

天宝十四载冬，安史乱起。几十年的文恬武嬉，唐地方守军面对祸起仓卒的叛军，几乎如枯木朽株，不堪一击，不到一月，河北、河东、河南和东都洛阳均为叛军所有。正在宣州的李白，匆忙间北上，携妻子宗氏（天宝五载，李白婚于宗氏。宗氏为武后、中宗时故相宗楚客之孙女。时宗氏居宋城）南下宣城，留在东鲁的一双儿女则不及携往。他将宗氏安顿在宣城，自己独往剡溪“避乱”。途中，白有诗与相知云：“我从此去钓东海，得鱼笑寄情相亲。”（《猛虎行》）又云：“张良未逐赤松去，桥边黄石知我心。”（《扶风豪士歌》）使他此次越中之行，颇带神秘色彩。所知者，是他行踪仅止杭州，匆匆来去，并无“避乱”迹象，所谓“钓东海”（用传说中任公子钓大鱼事）以及自比张良相遇黄石公云云，皆不知所指。但他在杭州曾与唐宗室徐王李延年会面（见《感时留别徐王延年》诗），返途中又与宗室吴王李祗会面（见《为吴王谢责赴行在迟滞表》文），不由人不产生一些猜想：李白岂是欲鼓动宗室起勤王之兵、而自己则参与其事建不世之功乎？

自杭州返回后，李白遂与宗氏隐于庐山屏风叠。不久，发生了影响晚年李白最重要的“从璘”事件。永王璘是玄宗第十六子，肃宗异母弟。安史乱起，潼关破，玄宗奔蜀。奔蜀途中，诏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经营北方以收复两京；以永王璘领江南西、山南东等四道节度使，经营南方。而先于此诏，李亨即位灵武，是为肃宗。永王璘奉诏驻江陵，囤积粮草，招募将士，扩充实力，并率水师东进。至德二载（757）春，永王舟师至

九江，派使者上庐山说动李白入幕。永王在江南的大动作引起肃宗不安，不久，兄弟阋墙，永王败死，李白因“从逆”罪判流夜郎。

永王璘是否心怀异志姑不论，李白则是将从璘视为他建功立业最好、也是最后一次机会。玄宗已经奔蜀，肃宗远在关内，国难当头，李白唯从璘一途。判流夜郎对他是一次致命打击。虽然中途遇赦，李白曾多次努力欲重新进入仕途，甚至长途跋涉欲从李光弼军，但心志已衰，他的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。衰病之中的李白往依当涂令李阳冰，托其编辑遗稿。李阳冰编成《草堂集》，并撰《草堂集序》，是李白文集流传至今最初的文本。代宗广德元年，63岁的李白在当涂赍志以歿。

李白的一生，是不懈地追求理想、实现其宏伟抱负的一生，同时又是理想与冷酷的现实碰撞、发生挫折和矛盾的一生。他的诗歌，就是他心灵历程的记录。了解了李白的一生，也就大致了解了李白的思想。

李白的思想非常复杂，儒、释、道甚至游侠的成分皆杂糅其间。前曾提及李白诗文中多称其“十五”之年：“十五学神仙，游仙未曾歇”；“十五学剑术，遍干诸侯”；“十五观奇书，作赋凌相如”。足见他的思想在少年时期即已基本形成。“学神仙”是指道家之术，如修身炼丹等。少年李白的好神仙，与唐时尊崇道教有关，而蜀中道风尤盛，距李白故里不远的紫云山，就是当时有名的道教圣地。蜀中青城山、峨眉山亦是。与李白一生关系甚为密切的道家流元丹丘，很可能就是李白蜀中结识的朋友。“学剑术”不单指学习防身武艺，更兼有企慕游侠的味道。

李白《留别广陵诸公》诗有云：“忆昔作少年，结交赵与燕。金羈络骏马，锦带横龙泉。”“龙泉”即宝剑。《赠从兄襄阳少府皓》诗云：“结发未识事，所交尽豪雄。却秦不受赏，击晋宁为功。”他本此下尚有“托身白刃里，杀人红尘中”二句。“杀人”云云，恐非全是狂言，与李白交游很深的魏颢在《李翰林集序》中曾说白“少任侠，手刃数人”，当出自李白自己对魏颢的“交底”。而所谓“奇书”，大约犹今之杂书、杂学一类。李白二十岁前后曾往梓州（今四川三台）从赵蕤学习一年有余。赵蕤著有《长短经》十卷，明王霸大略，宋杨天惠《彰明遗事》称其“任侠有气，善为纵横之学”。以上三者（道家、侠、纵横之学），几乎可以概括李白一生处世、行事大端：道家重自我，尚自由，任自然，物我两忘，不受世俗社会任何诱惑，亦不受社会任何约束；侠者注重行事果决、探奇冒险；纵横家追求一朝为帝王之师的人生目标，享大富贵而又富贵不居、意轻千金的洒脱人生。李白未言及儒家对他的影响。儒家讲求个人操守的培养，讲道德，讲仁义，重视现实。因重视现实而重视历史，又因重视历史而注重学术渊源，即自周公、孔子、孟子传承下来的儒家经典，以及与儒家经典紧密相关的史学、文学、艺术等。儒家尤其重视个人与家庭、团体、社会的关系：人不能为自己而活着，人生在世，“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；仰不愧于天，俯不忤于人，二乐也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《孟子》所说的“三乐”，都强调个体的“人”与生俱来的责任以及对他人的付出，无形中也也就是对人的束缚。这似乎与李白放荡不羁的个性是相违背的。但是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



统文化的主干，李白虽然杂收旁进，却不可能脱离儒学对他的影响；相反，在李白复杂的思想体系中，可以说儒家思想一直是主流的，占主导地位的。这表现在李白一生对功业不懈的追求，对自己的国家、民族（当安史之乱起来的时候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）强烈的责任感。“苟无济代心，独善亦何益？”（《赠韦秘书子春》）这是李白毅然决定参与永王幕府时发出的誓言，正是对道家的“独善”的批判。《老子》有云：“功成、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”又云：“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”道家的“无为”，只是对儒家“进取”的退让，是一种调和。李白一生的行事大端，既可以看做是受道、侠、纵横杂糅思想的驱使，更可以看做是儒家思想的驱使，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，再调和以道、侠、纵横思想。李白表示过敬佩的前代政治人物很多，如诸葛亮、姜尚、鲁仲连、王羲之、韩信、谢安等，但他最敬佩的人物莫过于谢安。谢安隐于东山，携妓、饮酒，美食风流，是道家者流（东晋玄风特盛，谢安正是玄学代表人物，而玄学的核心是道家学说），一旦出山，就为帝王之师，安邦定国，建不世之业。我们对李白一生经历的划分，除了少年读书时期以外，其他几个时期，皆是以他的数次政治活动为中心划分的。开元时期最大的政治活动是他三十岁左右的一入长安，此期其他的活动，例如出蜀后的漫游吴越，安陆的“酒隐”，遍干诸侯，则可以视作他为开展政治活动所作的铺垫：制造声誉、扩大影响。一入长安无功而返后，李白最大的政治活动就是争取再入长安。开元末的移家东鲁，固然是个人原因（许氏夫人去世）所致，又是他对居住地更接近政治中心的选择（相